

杜詩學發微

許總著

繆誠題簽



杜诗学发微

许 总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湖南路8号)

南京清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25插页6字数282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80560-056-2/I·13 定价4.50元

仍識杜少陵枝葉
未徑洞庭疏鍊江
風煙自抑揚
移移移一毫
游在多代晚
迷平生
小費琢磨
草堂迎雀
七言律詩
今故相鳴
聲滿浦
猶如含笑
望杜兄一和

壬戌立秋赴成都草堂
余加紀念

目 次

杜诗学大势鸟瞰（引论） (1)

内 编

唐人论杜述评 (7)

宋诗宗杜新论 (25)

论宋学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 (41)

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述略 (65)

要当掣鲸鱼 岂但看翡翠 (74)

——江西诗派杜诗学探微

蔡梦弼《草堂诗话》与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 (107)

金元杜诗学探析 (112)

明清杜诗学概观 (129)

以文论诗 寓刚于柔 (152)

——桐城派杜诗学阐论

吴见思与《杜诗论文》刍议 (182)

审音归母 谨严细密 (204)

——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初探

神州不乏他山石 李杜光芒万丈长………(219)
——试论闻一多杜诗研究的成就和意义

《杜甫研究》得失探………(237)
——兼论杜甫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 — 外 编

杜甫以诗为文论………(257)

杜甫以文为诗论………(270)

艰难诗万首 豪府至今名………(289)
——杜甫夔州诗评价之我见

铺陈终始、律切精深之发轫………(319)
——说杜诗《临邑舍弟书至苦雨》

从杜诗《后出塞》看诗人的预见性………(323)

从《江南逢李龟年》看杜诗的跳跃性思维………(329)

杜诗以晚期律诗为主要成就说………(333)

“诗圣”废名论………(345)

再论杜诗“忠君”说………(350)

后 记………(357)

杜诗学大势鸟瞰（引论）

一部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①，既象一座丰碑，在中国诗歌史的巅峰上巍然屹立，又似一块巨石，在文学批评史的长河中激起巨澜。仅据清代几种通行书目粗略统计，自宋至清，整理、笺释杜诗的专门著作即达一百一十余种，一千一百一十余卷；其他各家文集、各种诗话中的专门论述，更难以数计。不仅杜集形成编年、分类、集注、评点等各种类型和系统，而且对杜诗的分析、论说也形成各种观点和学派。杜诗研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

封建时代的杜诗学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中晚唐是杜诗学的肇始期。这时期杜诗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诗风的变化明显受到杜诗的影响。杜诗研究的主要观点以白居易对杜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思想内涵的阐发和元稹对杜诗集大成艺术成就的肯定为代表；而樊晃“采其遗文”，首次编成《杜工部小集》，则已开后代“杜诗辑注学”之先河。二、宋代是杜诗学的兴盛期。这时期杜诗受到人们的极度推崇，杜甫被尊为“诗圣”，杜诗被视同“六经”，诗坛几乎无不尊杜、学杜。人们在对诗歌的本质、功能、价值及创作主张的论述中，往往集中于对杜诗的评论和分析上，在儒家政教诗学的极度发展中，强调杜诗的社会功用，宣扬杜诗“忠君”说，即成为这一时期杜诗学的主要观点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同时，由于对杜诗的推崇，辑注杜诗更蔚为一代之风，所谓“千家注杜”，可见其盛况。三、金元时期是杜诗学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由于宋代的强大影响，杜诗学仍然

①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处于宋学的笼罩之中，但是由于社会的动荡，道统的相对薄弱，金元的杜诗研究者又往往能从诗歌的审美要求和缘情特性出发，显示出由宋代杜诗学重教化到明清杜诗学重审美的转变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作用。同时，金元注杜较之宋代更显出多样化趋向，也成为明清杜诗辑注学极盛之前奏。四、明清时期是封建时代杜学的总结期。这时期，由于艺术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对杜诗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及审美价值的阐发和探讨成为杜诗学的主流，同时，随着诗坛流派纷呈，杜诗研究也明显带有各种诗学理论的烙印，而在这种繁荣之中，儒家政教观和审美意境说的并存、对立至于击撞、交融，正是中国古典诗学之总结的典型体现。再者，随着考据学风的兴盛，“杜诗辑注学”出现了极度繁荣，其中《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镜铨》、《读杜心解》等著名注本的价值，就不仅在于其卓见新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前代研究成果的包容和总结。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提倡的不同以及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儒道思想的发展和兴衰，诗歌理论总是通过具有这两种思想根源的文艺观反映着那一时代的政治社会思想。杜诗的成就和地位，使其往往成为诗歌批评中首先选取并重点剖析的目标和对象，因此，杜诗研究也总是敏锐地体现着时代思潮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和发展。在儒道并重的唐代，在儒家诗教与审美诗学的同时发展中，杜诗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就同时为人所重视。在宋代，统治阶级为了与暴力集权统治相适应地加强思想意识统治，理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因此，在儒家政教诗学的极度的片面的发展中，杜诗也就成为“忠洁之志”的集中体现和宣扬“忠君”思想的工具，杜诗研究更几乎成为儒家经学的附庸。金元到明清时期，从社会的动荡、道统的薄弱到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而孕育的作为儒学异端的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

巨大启蒙思潮的出现，在理学家诗论的僵化和审美诗学的发展中，杜诗研究也逐步突破了宋学的思想桎梏，从对缘情特性的肯定到对性灵个性的强调，从对音律节奏的规律的总结到对篇章结构等形式美方面的探求，杜诗从经学附庸到文学价值的恢复，是时代发展的结果；然而，清初统治者为了重新强化封建统治秩序，推行更为残暴的统治政策，并仍然以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实行思想禁锢，使明末解放潮流受到严酷的打击，因而以政治教化曲解杜诗的理论仍然占据相当的地位，这种在新与旧、解放与禁锢、审美与教化、个人情感与政治功利的矛盾的对抗和交织中体现的杜诗学理论的两重性和复杂性，也是封建末世种种矛盾交织的时代折光，同时，清代“杜诗辑注学”随着考据学风的兴盛，也正是知识分子为了逃避祸患，纷纷躲入古籍整理的象牙之塔的时代产物。通过以上对封建时代“杜诗学”体系和过程的大略清理，不仅展示了其与时代发展的紧密联系，而且可以窥见唐以后诗学发展的大体轮廓。

清代的杜诗研究作为一千余年封建时代杜诗学的总结，无疑也标志着其终结的来临。但是，随着时代更新，理论必然发展，科学研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因此，杜诗研究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岑寂的时期之后，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重又恢复了生机，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然而，在历史上的杜诗学的丰硕成果面前，建国以来的杜诗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的重大发现和开拓；①另一方面，随着近年古典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流作家作品被研究“滥”了，人们转而以对二、三流作家作品的研究来“填补空白”的趋向，杜诗研究也预示着黯淡的前景。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封闭体系造成的沉闷气氛和陈旧方法的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参阅拙文《〈杜甫研究〉得失探——兼论杜甫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历史证明，每一时代总是应当具有超越前代的理论高度，运用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老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和结论，而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流”别的下降，却是研究工作的悲剧。因此，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总结、分析、评判历史上杜诗学的成果，不仅可以开辟当前杜诗研究的新领域，建立科学的“杜诗学”体系，而且可以引为借鉴，更新观念，对杜诗本身也必然能得到超越前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更可以完成杜诗研究中至今没有完成的一个由作家到作品再到接受者的文学研究的完整过程。

内 编

唐人论杜述评

杜诗普遍为人所重，当在宋代，学人多有此论。然而，唐人对杜诗的评述，仅就流传至今的材料看，其数仍不为少，而其对杜诗的主要看法与观点，对杜诗各个方面的广泛评说，亦可渊被后世。对此，历代学者非但未予足够重视，且有唐人不重杜诗之说。清人沈德潜撰《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并自称有别于“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①。然仅据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著录的“唐人选唐诗”就多达七十余种，而流传至今才十种，可见散佚之多。有目无书的顾陶《唐诗类选》即以李杜为冠，入选大量杜诗；流传至今的韦庄《又玄集》亦选有杜诗。可见沈氏此论仅就清代传世的“唐人选唐诗”而发，颇欠周全。今持此说者，亦同沈氏之病。

两宋以还，杜诗研究资料浩如烟海，其中理论问题亦趋深化。然而，“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②因此，探讨杜诗研究肇始时期的唐人论杜中的几个代表性问题，对于清理杜诗研究的发展线索，进行整个杜诗研究史的研究，当属重要而必要的一环。

一、唐人对杜诗艺术的推崇与总结

杜甫晚年所作《南征》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诚然，杜诗在当时确有为人轻视甚至诽谤的现象，王贊《玄英先

①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生诗集序》云：“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但这只是唐人对杜诗态度的一个方面。即从王贊为杜诗遭遇的不平之鸣，也可窥见唐人对杜诗态度的另一方面。检阅有关材料，有唐一代，无论杜甫的前辈、同辈、后辈之中，均有对杜诗推崇备至者。

杜氏自七岁属辞，少时即迥异寻常，才高气盛，脱略时辈，清狂放荡，下笔如有神助。当代名公硕学，亦对其赞誉不已，这从杜氏后来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壮游》等诗中忆及此段历史时所述“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可见一斑。李邕、王翰、崔尚、魏启心都是当时著名诗文家，在文坛享有很高声誉。就连位居左丞的韦济也对杜氏相当赞赏，“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如果说，这些都是从杜诗中见出，而李邕等人均无直接称赞杜甫的诗文流传下来，因此缺少证明这些情节的第一手资料的话，那么，再看一代人主并精于文学的唐玄宗因见杜甫所献诗赋而大为惊奇，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①使杜氏踏上仕宦的初途，成为其人生一大转捩，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杜氏在漫游齐赵与十年长安时期，几乎和当时著名诗人都有交往，并与之唱和。然而，在众多盛唐诗星如李白、王维、岑参、高适、贾至、严武等人集中，对杜诗直接评价之词却鲜见存留，殊为缺憾。今日可见的与杜同时人直接称颂杜诗的，却有三位不甚知名者的诗篇幸以流传。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

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
地湿愁飞鹏，天炎畏跔鳱。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新唐书》卷二百零一。

郭受《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

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醪酒熟傍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

任华《杂言寄杜拾遗》：

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

三诗不仅摭发了对杜甫“旧德朝中属望劳”、“何曾一日不相思”的崇敬、亲挚之情，且对“海内流传遍”的杜诗给予“大名诗独步”的高度评价。虽仅见此三例，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代表了杜甫同时人对杜诗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为后世研究唐人论杜提供了最早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说，韦迢、郭受对杜诗作了极度的推崇，那么，任华则更注意到对杜诗艺术的概括与总结，因此，任诗更值重视。“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波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正是“鲸鱼掣海”的杜诗气势的形象描绘；“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与杜甫自负“气翻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之旨亦相契合。可见，任氏实为杜氏之知音。然对任诗之真伪，论家却曾异议，清人仇兆鳌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杜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傲睨放恣，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纪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

高雅，俱属可疑。”①细察此论，颇多臆测，难以为据。今查《唐摭言》、《文苑英华》均录有任华作品，《唐诗纪事》更有高适赠任华诗，可见当时确有其人。而任华赠杜此篇，见于唐人韦庄所编《又玄集》，时代不违，当属可信。

诚然，即如上述，杜诗在当时所受推崇仍非普遍，一些赞颂之词亦未能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而其在诗坛地位的真正确立，则是“寂寞身后事”了。杜甫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首编杜集，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樊氏不仅推尊杜氏为“当今一人”，且认为杜诗乃“大雅之作”。《说文·徐笺》：“雅为正声。”自《三百篇》后，“雅”实际上已成为传统的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与美学要求，刘勰、钟嵘曾运用“雅”的标准开展文艺批评，陈子昂、李白、元结、白居易等人亦标举“雅正”之旨。樊氏运用传统文论标准，对杜诗作充分估价，固为卓见；而“采其遗文”，类编成集，开后代杜诗辑注学之先河，更是功不可没。

嗣后，由于中唐名公极加推崇，杜诗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即达登峰造极之境。韩愈《题杜工部坟》：

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

①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附录《诸家咏杜》。

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

韩氏观有唐之史册，衡杜诗之成就，从而得出“称全美”、“无拟伦”的结论，所谓“洗俗”之风、“回春”之笔，亦同樊氏“大雅”之说，可见韩氏论杜实乃承樊氏而更为发挥。同时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亦云：“索其风雅比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当此之时，对杜甫最为有力的推崇与对杜诗艺术最为全面的总结，当推诗人元稹。元氏《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其《叙诗寄乐天书》亦云：

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元氏纵观诗歌发展的渊源与风格的流度，将杜诗与其中代表作家相较，具体说明了杜诗对前代艺术的全面继承与发展而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并证明了“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的总命题。其时，韩、白、元诸公为诗坛柱石，因此，他们尤其是元稹对杜诗的评论，对于中唐以降必然产生极大影响。晚唐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崇杜学杜，莫不皆然；五代刘昫撰《唐书》，①在

①按照惯例，五代亦纳入本篇研究范围。

《杜甫传》中更备载元稹之论，并云“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纵观中晚诗坛，元稹之论，奠定了后世杜诗研究以及杜诗本身地位的基础，但同时也“反映出唐五代人的看法”^①，集中代表了当时的一部分舆论，形成杜诗研究的一种总的趋向。

二、唐人对杜甫身世与思想的探索

自孟子读诗，尝欲“知其人”、“论其世”^②，“知人论世”遂成为后代文学鉴赏者与文学批评者的准绳。杜甫生活于唐帝国的历史转折时期，飘泊流离于乱世，无论“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战地，或“影动千官里，心苏七校前”的宫庭，皆亲身所历；而其写实之笔，备叙无遗。因而，这一时期的民生国事与杜氏本人的漂流踪迹，便构成一部杜诗的主要内容。因此，杜诗本身即成为论家研究杜诗的“知人论世”的重要依据，清人仇兆鳌甚至说：“两史记事，多有舛误，杜传尚然，其余差谬者，亦当据杜诗正之。”^③

樊晃《杜工部小集序》首次对杜甫身世作概括性叙述：

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属契阔湮厄，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

杜氏生前情形，其诗备叙，论家盖无异辞；唯其辞世之因，则多疑义。樊氏所述“缘湘沅而不返”，颇为含糊。元稹《杜君墓系铭》云：

①卞孝萱《元稹年谱》第209页。

②《孟子·万章下》。

③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本传按语。